

Niccolò Machiavelli

Lettere

马基雅维利全集 | 05

书信集·上

段保良 译



Decemviri
Bano Rosp. Jordano

Si metti

014044238

K835.467

16

V1

马基雅维利全集
书信集 (上)

段保良译



K 835.467

16

V1




北航

C1732237

Niccolò Machiavell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Niccolò Machiavelli
Letter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B. Atkinson and David Sices, De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依据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英译本译出

学术顾问

潘汉典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法学家

何兆武

清华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历史学家

徐大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资深政治学家

王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深翻译家

刘儒庭

新华社译审，意大利语翻译家

田时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意大利语翻译家

周春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基雅维利研究专家

编译委员会

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永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徐卫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段保良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胡维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

叶心

长春市图书馆

刘训练（统筹）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出版说明

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曾经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自然辩证法·导言》）。仅在意大利，就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这样的文学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样的艺术大师，而马基雅维利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最杰出的代表。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喜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简称《李维史论》或《论李维》）、《用兵之道》（又译《战争的艺术》、《兵法》）、《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此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剧作、出使通讯、政务札记和私人书信等。

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比较复杂，但各种全集收入的内容只有少量出入。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由各卷译者自行选择底本，依据、参照比较权威的版本译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Machiavelli”，国内还有“马基雅维里”、“马基雅弗利”等译名，这里我们统一为“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的中译名也不尽相同，但并无实质性分歧，为了尊重各卷译者的意愿，我们没有强求统一；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比如 Virtù）的译法，学术界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也没有强求统一；其他常见专有译名，我们则尽量作了统一。

英译者序

就这个本子上说几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保留了意大利文编者在马基雅维利的公务通信与私人信件之间作的略有几分人为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有其缺点。二者之间并非总是界限分明。此外，在纳入研究的时段以后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的信件，并不是都以意大利文刊印过。我们的文本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现行最好的本子，即加埃塔为都灵联合出版社编定的1984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Opere: Lettere*, ed. Franco Gaeta, Turin: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我们又作了若干增补，依据的是因格莱塞的《（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圭恰迪尼书信集》（*Lettere a Franc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orgio Inglese,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1989；这个版本的注释十分有用）以及加埃塔本发表以来的学术成果。我们还参考了1961年加埃塔为费尔特里内利（Feltrinelli）编定的一个更早的《书信集》。

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的现代出版史始于阿尔维西（Edoardo Alvisi）的本子，1883年由桑索尼（Sansoni）在佛罗伦萨刊印，加埃塔在他1961年的本子中使用过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加埃塔的第一个书信本子出来

后，好几位意大利学者受到了鼓舞，去更细致地考订这些通信：里多尔菲写了三篇文章（Roberto Ridolfi, “Per un’ edizione critica dell’ 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al Vettori del 20 aprile 1513,” in *La Bibliofilia*, 68, 1966, pp. 31–50; “Le carte del Machiavelli,”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1–23; “Contributi all’ 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del Vettori del 16 aprile 1523 nel testo originale inedito,”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259–264）。同一时期，另一位学者贝尔泰利为准备自己的本子而写了两篇文章（Sergio Bertelli, “Carteggi machiavelliani,” in *Clio*, 2, 1966, pp. 201–265; “Appunti e osservazioni in margine all’ edizione di un nuovo 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in *Il pensiero politico*, 2, 1969, pp. 536–579）。关于《书信集》之作品的出版，1969年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贝尔泰利出版了他的本子（*Epistolario*, Milan: Giovanni Salerno; reprinted by Verona: Valdonega, 1982）；其次，吉列里发表了一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基于笔迹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拼法》（Paolo Ghiglieri, *La grafia del Machiavelli studiata negli autografi*, Florence: Leo S. Olschki）。1971年，马尔泰利写了一篇论文（Mario Martelli, “Memento su un’ edizione dell’ 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in *La Bibliofilia*, 73, 1971, pp. 61–79），还出版了他编校的马基雅维利《作品全集》（*Tutte le opere*, Florence: Sansoni），这个本子对现存的书信文本作了细致的重校。我们所据的加埃塔1984年本，就相当倚重马尔泰利的作品，尽管加埃塔改进了意大利文的拼法。

以1883年刊印的阿尔维西文本来，马基雅维利的多数信件已由阿兰·吉尔伯特（Allan Gilbert）译成英文，并先后多次独立刊行（in *The Prince and Other Works*, Packard and Company, 1941; as *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 Capricorn Books, 1961, re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in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89）。有16封马基雅维利的书信，收于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年版的《马基雅维利文学作品选》（*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translated by J. R. Hale; reprinted by Greenwood Press, 1979）。

本书题注之设置主要是为了给马基雅维利的动荡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件设定背景。有时由于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书信数量相对较少，所以我们把两年或数年合并成一组；在这些情况下，有的题注便没有按年份分开。题注试图将通信中提到的人物和地点置于一个历史框架内，因此不可避免会给人以一份有几分扭曲的马基雅维利传略，因为它们要服从书信集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对其生平和时代作一种综合平衡观察的需要。

脚注之设置则是为了说明除了专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意大利语的专家而外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材料。^①加埃塔为1984年本子编制的注释极为有用，出处均以括号夹注的方式标出，以申谢意。拉伊蒙迪（Ezio Raimondi）为他的《马基雅维利作品集》编制的注释也同样有用，我们参考的是穆尔西亚出版社（Mursia）1976年在米兰印行的第7版，出处亦已用括号夹注的方式标明。^②我们还应该提到，关于加埃塔1984本的两篇评论在文本和注释方面都对我们深有助益：第一篇来自格拉齐尼（Filippo Grazzini, in *Lettere Italiane*, 36, 4, October–December, 1984, pp. 605–609），第二篇来自因格莱塞（Giorgio Inglese, in *La Bibliofilia*, 86, 1984, pp. 271–280）。在脚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数量众多的其他材料，以缩写的形式列于书后。“征引文献”不应理解为一份详尽无遗的书目，因为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及其背景的重要研究成果没有出现在里面。——指明注释中用到的所有证据的出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于注释编写过程中的疏忽和不当之处，要先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

索引意在帮助读者查阅特定的人物和事件。^③索引中的拼法尽量整齐

① 中译本对这些脚注作了一些取舍，特此说明。——中译者注

② 事实上，英译本注释主要采自加埃塔以及因格莱塞，参照拉伊蒙迪的注释极少。——中译者注

③ 因为技术性原因，中译本代之以人名、地名对照表，所以也就不存在下面说到的页码显示问题。——编者注

划一，因为各通信人的拼法并不总是一致。名称出现于本书导言和题注时，相应页码以粗体标示，以便跟它们出自于实际通信时相区分。这样一来，读者或能更容易考索个体在其历史语境中的经历，察知他们在全部书信文本中被提及时其人物形象的可能演变。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本书的翻译。为了保持信件作者们语言风格的一致，西塞斯（David Sices）译出了致马基雅维利的信件，阿特金森（James B. Atkinson）译出了出自马基雅维利的信件。我们互相审阅了对方的作品，但终稿大体上代表负责一方的理解。在使译文尽可能接近意大利原文的同时，我们努力使这些书信既能读懂又有趣味。几封全篇译自拉丁文的信件，以及译自意大利文信件中的拉丁文词句，在这个本子里以斜体印刷。^①另两种排版标记是方括号及用以注明加密材料的尖括号。除非另行注明，方括号是标识译者所作的文字订正和加埃塔文本中的阙文。我们依据加埃塔标记插入尖括号，提醒读者注意加密的语句；不过从加埃塔文本来看，加密材料止于何处并非总是一目了然。脚注、题注和导言是阿特金森编写的。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达特茅斯学院古典系安德鲁·费尔德赫尔（Andrew Feldherr）的帮助、达特茅斯学院的拉蒙·格思里基金（Ramon Guthrie Fund）和系主任办公室的慷慨资助，以及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向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项出版经费。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的帕特丽夏·卡特（Patricia Carter）在原始资料及二手材料的获取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的温迪·沃恩肯（Wendy Warnken）极度认真细致地参与了我们项目的实施，在此一并致谢。

① 中译本以楷体印刷。——编者注

英译本导言

阿特金森

有句人们熟知的曲言谓：“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毋庸介绍。”人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重要。《君主论》和《李维史论》早已把一位伟大的政治、历史思想家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就一位五百年来既遭谩骂又受崇敬的作家而言，任何“引介”或许均属无用。

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书信作者却并非广为人知。对于多数读者来说，透过其私人通信去熟悉他，或许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信件表达了他的当务之急，揭示出其人格的多重面相，这些东西并非总能在权威的大学课程资料中得到反映。在他的书信里，自然有丰富的证据，关乎他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熔铸古今历史，如何将其政治思想锤炼得清晰透彻、精义入神。不过从中亦可看到一个不那么令人熟悉的马基雅维利：文学艺术家马基雅维利，小说家马基雅维利，剧作家马基雅维利，自画像大家马基雅维利，恶作剧者马基雅维利。换句话说，一个自觉的马基雅维利显身了。

这些信件中有些通信人需要某种引介。通过阅读这些书信，比亚焦·博纳科尔西、菲利波·卡萨韦基亚、米圭尔·德·科雷拉、路易吉·圭恰迪尼、安诺洛·图奇、乔瓦尼·韦尔纳奇和阿戈斯蒂诺·韦斯普

奇等人变得熟悉起来。其他人则不大需要引介，不过，在这些书信的语境里，读者对诸如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皮耶罗·索德里尼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等众所周知的同时代人物的感觉，会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切。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设法应付万事万物，从对诸如命运和理想国家的抽象观念到办公室政治和性等日常事务，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时代。这个马基雅维利，接收庄稼收成报告，表达对税收增加的苦闷，告诉年轻的儿子去“好好学习，刻苦攻读，因为你若成全自己，每个人就会成全你”，接着又建议他如何处置一头烈性的小骡子，似乎不大像莎士比亚笔下格劳塞斯特公爵理查德所谓的“凶残的马基雅维利”（《亨利六世》下篇第3幕第2场）。

是故，向读者引介马基雅维利私人通信的程序就要反过来。这些信件除了向读者引介许多或常见或不常见的人物，凸显出他们的思考过程和性格特征外，也是其自身的引言，让我们更好地熟悉它们赖以产生的整个语境。马基雅维利的书信，由于对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读者弥足珍贵，长期以来已被视为他在政治和历史著述中更完整地提出的众多观念的试验田。它们在阐明和塑造他思想的新方向时，也对他的朋友们作出了敏锐的回应。在这些信件的活泼泼的互动中，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收放自如，常常是十分明显和极令人兴奋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信件赖以产生之语境的重要性。为了真正进入这一语境，我们必须首先从外围开始，发掘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们及其朋友们的更多情况。然后，我们要更好地观察，他是如何有意识地用书信来创造一幅自画像以及锤炼自己思想的——这二者经常同时进行。最后，我们方能聚焦于这一语境对马基雅维利所具有的激发性意义。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及朋友

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人并非具有同等重要性。诸如唐米凯洛托（米圭尔·德·科雷拉）等人不过是偶然的相识，写信谈及公务上的枝节问题。

诸如乔瓦尼·韦尔纳奇和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等人，尽管对马基雅维利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至关重要，却不是经常的通信人。韦尔纳奇作为亲属，既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又是他的心腹知己，二者的关系比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及圭恰迪尼之间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更真挚。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与马基雅维利关系甚浅，却是其国民军计划的大力仰慕者。相形之下，菲利波·德·内利是马基雅维利的那么一个爱恨交加的仰慕者，甚至不可以恰当地称其为“朋友”。但是，像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和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等朋友对马基雅维利的忠诚和爱戴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对于所有好朋友来说都一样，接纳他们意味着必须同时接纳他们的瑕疵。更著名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同样有其瑕疵，但在这些通信里，他们实质上是舌战对手和充满活力的参与者。无论其缺点如何，每个人均有其内在的价值，不可或缺地在通信中占有一席之地。

倒霉的唐米凯洛托是西班牙人，曾任切萨雷·博尔贾的副将，后来在1507年任佛罗伦萨国民军指挥官，为马基雅维利效力。尽管其语言和文风充满缺陷（书信146和147），但他急切地渴望向马基雅维利证明他有理。请想象一下跟这么个人打交道的情形吧，在一通绕脖子的解释里，他就自己与马基雅维利及执政团（the Signoria）之间的关系这样写道：

圣灵作证，如果您觉得我在这方面已犯下过失，我恳请阁下告诉那些把此事与您扯上关系的人，与阁下一道赐予我诸位阁下看着合适的无论什么悔过自新的机会。……改天我与阁下见面时，我会告诉您种种事情，给您它们的真凭实据，准会让您震惊，我没有写信的习惯。阁下知道，我今生今世已侍奉过几位国王和两位教皇，若非他们屈尊降贵答复我，我从来不给他们写信，尤其是在涉及为圣座和诸位阁下效力的事项上。我一直致信给尊贵的执政团和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我跟诸位阁下共事已一年半，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我

以为这是本国的习俗，因此我并不见怪。我曾发誓不写信说这件事，但我不得不为之向阁下辩护，因为我知道您喜欢我爱护我。我绝不会向世上任何人写信对此吐露半个字。

在这部通信里，唐米凯洛托只是个小角色。然而，为了避免我们以为精理奥义和华辞丽藻是马基雅维利所身处的一切语境的特征，我们只需要看看唐米凯洛托所提供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挫折感，马基雅维利同样要面对这种挫折感。

为了缓解这些挫折感，马基雅维利一直依赖他的外甥乔瓦尼·韦尔纳奇，这个商人在致马基雅维利的书信中（书信253和268）充满了商业上的利害考量。从他的友谊、忠诚和爱戴中，马基雅维利显然获得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在他与韦托里的活跃通信一度中止时。不过，韦尔纳奇仍是个谜。他的信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让人看出为什么马基雅维利在身处政治贬黜的忧愁中，会选择如此彻底和经常地向他披露自己的灵魂。1515年8月，马基雅维利写道：“光阴这东西，让我甚至忘记我自己”（书信248）。六个月后，1516年2月，马基雅维利慨叹：“至于我，我已经对我自己、家人和朋友们毫无用处，因为我的悲哀的命运早已注定如此”（书信250）。这种自我怀疑在1517年6月终于变得直截了当：“我所遭受的以及正在遭受的诸多厄运，已迫使我依赖田庄为生，我有时整月都不会想到我自己”（书信252）。

让马基雅维利打消失望情绪的，有沃尔泰拉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佛罗伦萨正义旗手、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他所有书信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羡慕马基雅维利的才思敏捷。至少两封写作时间隔了四年之久的书信，流露出他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敬重。1502年9月，这位枢机主教以拉丁文给马基雅维利写信感谢他的一封“措辞优美的来信”（马基雅维利在信中显然是因他的哥哥当选为佛罗伦

萨终身正义旗手而向他道贺)。其中说：“值此共和国危亡之秋，我们自己要始终肩负着如下责任，那就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极为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和公民同胞贡献自己的能力和热血。由于您在能力和赤忱方面首屈一指，您不但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极为宝贵、极受欢迎的一分子”（书信31）。马基雅维利与索德里尼兄弟的这种相互的敬意，因他们共同致力于佛罗伦萨的事业而愈见深厚。这位枢机主教是马基雅维利国民军思想的热烈支持者，将国民军称为“上帝的恩赐”（书信139）。1506年3月4日，为了答谢马基雅维利的一封长信，这位枢机主教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说：“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您新的军事思想的来龙去脉，这种思想符合我们对国家的幸福和尊严的希望。……这种意义重大之事物从您手里开始，您想必已获得不小的满足。……您所写的东西，任何持论温和的人都读得进去。若您尚未尽全力于此，……那么请考虑您若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学识之力投注进去，这项事业会变得多么杰出。我们恳请您尽量这样做”（书信109）。

诸如菲利波·德·内利这种不为马基雅维利所欣赏的通信人，他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内利是一个贵族，是参与鲁切拉伊花园纵论剧谈的常客，这些谈话最终导致马基雅维利写了《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用兵之道》和《卢卡人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内利于1520年11月17日写信急切地索要后两部作品（书信265）。内利的《论1215至1537年的佛罗伦萨政事》直到1728年才出版，这部作品证明他是马基雅维利的热烈仰慕者。有人甚至认为，这位历史学家内利是马基雅维利的弟子。内利经常说话尖酸恶毒，然而，在他当摩德纳总督时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却全然看不到这一特征。他热烈地说道：

您和“砖窑工”真是煞费心机，以至你们那场狂欢的盛名，已经且将继续在全托斯卡纳地区乃至全伦巴第地区流传。……您的喜剧的

盛名已满世界飞扬。您不要以为我是从友人的信里听说了这些事，实际上我是从大路上往来的旅人那里听说的，他们念叨着圣弗莱蒂亚诺门的“辉煌的庆典和壮丽的景观”。我确信，这场大狂欢的壮观不会只限于留在托斯卡纳境内，而是必将驰向远方，飞越群山万壑……总之，尼科洛，……我希望您尽快送给我这部新近上演的喜剧。（书信286）

这封信上的署名是“弟某”，这是一个程式化的结束语，但在这个例子里，却显得十分扎眼。没过一个星期，内利就给马基雅维利的内弟弗朗切斯科·内罗写信，表达了对听闻《克莉齐娅》演出情况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把这两封信放在一起读，人们或许会把第一封信视为内利对马基雅维利的“阿谀奉承”。尽管致内罗的这封信流露出一种清高，不过他听闻的东西还是让他心痒难耐，以致希望得到“砖窑工”的府上所演出的这部戏剧的一个私人赠本：

鉴于“马基雅”^①是您的朋友和亲戚，也是我的好朋友，值此给您回信之机，我忍不住要说，对于每天入耳的有关他的传闻，我是多么苦恼。因为在最近以及狂欢节期间，我听到了那么多的抱怨，以致我对本城的一切邪恶行径已无动于衷了。……人们津津乐道，说这个有家有室的人，神魂颠倒地爱上了某个我还是不说名字为好的女人，而且写了一部据说内容荒唐不堪的喜剧。……我恳请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尽早尽快纠正这些事情，不过不要把我扯进去，而且为我请求他给我回信，送我一部“砖窑工”的院子里上演的剧本。^②

① 原文是Machia，可以理解为Machiavelli的简写。不过，维罗利指出，il Machia是朋友们给马基雅维利取的绰号（《尼科洛的微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读音近于alla Maccia（意为潜入森林、落草为寇），所以也可意译为“悍匪”，显示其诙谐、玩世不恭的天性。——中译者注

② 这封信的文本见加埃塔关于书信286的注释。

对自己和马基雅维利的关系不像内利那么矛盾的五个人，无疑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第一个是忧郁的菲利波·卡萨维基亚，马基雅维利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不过同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一样，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他的嘲讽和机智颇令马基雅维利开心，以致马基雅维利多次把他写成一个同性恋冤大头来拿他开涮。他们的书信往还使菲利波忍不住吐露心曲：“在这个卑劣而致命的深渊里，我找不到些许安宁。”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深得马基雅维利之心，我们从接下来的文字里可窥见一斑：

要是我有痴言怨语到了您的耳里，您想必不曾、也不应感到惊讶。如果我特别留意过对其有何补救之法，在我看来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让自己去承受凶恶的命运女神^①的折磨，但对此我并不完全赞成：鉴于命运女神喜欢新事物，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把我领进城中淫荡

① 马基雅维利及其朋友们在通信中使用*fortuna*和*virtù*时，颇考验译者的能力。一般来说，当我们认为作者在上下文中以*fortuna*指那种与人的心智力量相对抗的、强大的、遍及一切的、反复无常的力量时，我们译成*Fortune*（命运女神）；当我们认为作者是指好运或霉运时，我们译成*fortune*（命运），尽管显而易见，“命运”常常是“命运女神”操纵的结果。无论“命运”还是“命运女神”，都无法与多义词*virtù*分开，因为这些通信人经常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由于*virtù*一词可以引申出一系列的潜在含义，我们一般不予译出（这个词出现在书信176、219、222、241[两次]中，它们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译作“能力”或“实力”，并夹注原文。——中译者注）。“美德”（*moral excellence*）这个意义上的*virtue*极少能够对译*virtù*；“靠……的力量”（*by virtue of*）这个意义上的*virtue*，大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语*virtù*的用法。特别就马基雅维利而言，*virtù*暗示一个人在发起有效有力的行动时的裕如（*flexibility*），这种裕如乃是基于英勇坚定的意志以及将自己慎重考虑的结果付诸执行的能力。因此，*virtù*“似乎是造成马基雅维利思想暧昧不清的关键……一方面，我们借*virtù*改弦更张、开启我们的预测式控制以外的许多可能，从而导致我们成为命运女神的猎物；另一方面，*virtù*内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借之抗拒命运女神，并把许多秩序模式强加给她，这些秩序模式甚至可能成为道德秩序模式……个人越是依赖他的*virtù*，他就越不需要依赖他的命运，他也就越安全，因为命运本身是不可靠的。但如果*virtù*是我们借以获取权力的东西，那么理想类型……是个人完全通过运用其自身的才能获取权力，他之取得权力，根本就不是他身外的偶然事件和环境的结果”（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p. 167）。卡恩把这些考量同他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修辞”结合起来，发了一通重要的议论：“在偶然性王国里，新君主所面临的政治革新问题是修辞问题：这些问题不能通过运用固定的道德教条或单纯用力量来解决，其解决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模仿、陈述和说服。所以，修辞不仅仅是*virtù*的工具，而且在二者均能对偶然性王国或命运作出应战这个意义上是类似于*virtù*的东西；并且，所谓的*virtù*乃是对于目前形势的修辞性分析的产物，亦随形势而变化，*virtù*因此是修辞性的。政治革新乃与修辞之发明不可须臾离”（Kahn, *Machiavellian Rhetoric*, p. 17）。